



第二期抗戰展開後

敵人的狂論



MG
06P3.09
164
3

後開展戰抗期二第

論 狂 的 人 敵

譯 選 弦 韋



3 1798 6701 9

內容目次

中日事變已入第二期

一 事變已入第二期

二 蔣氏不肯屈辱的心境

三 中國共產黨抬起頭來了

四 事變和德英美的態度

五 結論——新責任的醒覺

議會和戰局的收拾

長谷川和山本實彥對話

現代日本的思想形態

對華文化政策之明日

一 文化事業的意義

二 中國的文化現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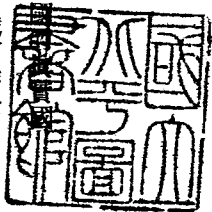
三 對華文化事業再建設的基準和方向

關於中日紛爭解決上的示唆

選譯者序言

戰時我國黨軍政界和智識界乃至一般民衆所最急需的常識，莫如敵情和代表的言論之窺探和報告了。這不特能助軍事上得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把握，且助後方人士洞悉敵國的陰謀，作適當的準備乃至言論上的批駁及反宣傳，使我國人民明知敵人把事實歪曲了，甚或故意造謠，到什麼程度，纔不致受其麻醉，而自亂其「最後勝利」的信心和勇氣。同時還可藉爲宣傳上的一種批駁的口實，使外國人也一同明瞭敵方的詭計及無理。

本書所選譯的資料，就是實行着上述的意旨。其內容是：(一)松本重治所作：中日的事變已入第二期，(二)馬場恒吾所作：議會和政局的收拾，(三)長谷川與山本及一原三人的對話，(四)船山信一所：現代日本作的思想形態，(五)上崎孝之助



所作；對華文化政策之明白，(六)二見甚鄉所作；關於中日紛爭解決上的示唆。我們細閱這六篇東西的內容，總可得到以下幾種的新智識：(1)敵人至今仍以「親善」爲假裝的口號，要想用「口蜜腹劍」的毒計，引誘我們早晚解除敵意，入他們的牢籠。(2)敵方的智識界，明知自己作賊心虛，處處流露厭戰的口吻，却因受着軍閥的高壓，粉飾勝利以取媚，表面似乎要勸我方息戰，而裏頭實爲他們自己救苦救難計。(3)他們因對於侵畧的罪惡無可諱飾，竟強詞奪理地說到我們的國民性和他們的不對，我們的黨國政治和他們的專制政治不符，我們的最高領袖不合他們的脾胃，兩國間的懸案，必要照他們的意旨解決，這樣對於一般事實的歪曲和誤解，還敢明目張胆地堅持着，可認爲敵人真沒有悔禍之心。(4)我們通觀這六篇東西，覺得敵人欲早結束戰事之故，無非欲早得實行其經濟侵畧的手段。一切偽政權的組織企圖與僞文化的宣傳政策，都是爲其最後的經濟侵畧之方便物。而其經濟侵畧的鬼謀，是有幾分抄襲那種「布洛克的經濟組織」(Boecksystem)——也可譯作「封鎖的經濟圈

組織」，即是要完全以我國爲原料的取給地和商品的銷售地，而仰他們爲經濟同盟的宗主國，這樣，中國遂成爲他們的禁嚮。這種毒計，他們的經濟學者，在「九、一八」以前已曾主張過，我們是不能不特爲揭破的。

在這六篇東西之中，最覺無理取鬧的，是最後二見甚鄉那一篇，他直白承認這次的侵畧戰，不是由少數軍閥的包辦，實由於敵人全國的公意。這種狂論，或者是有意取媚於軍閥，未必是他們全國公認的。獨有馬場恒吾那一篇，暗寓着對於軍閥的諷刺，承認敵國壓制輿論之非計，並且承認國會對於國策的決定上有檢討和動議修改之權。這或可代表敵國中的元老派的意見之一部，他有些地方雖仍替軍閥辯罪，但仍不如二見氏之極端。總之，十個敵人之中，有九個半是陷於「誇大狂」，現在第二期戰事方展開，我方在節節勝利之中，把敵人這種「誇大狂」的話來反觀一下，正覺得可憐還可笑呢！

二七·四·十·

中日的事變已入第二期

松本重治著

一 事變已入第二期

中日的事變，到了現在，已入于第二期了。上海，南京，杭州等既已陷落，山東的大勢已定，皇軍的威勢，至此已算是南北相應，津浦線以東的廣大區域也被制壓下去了。舊臘在張家口已經成立「蒙疆自治聯盟政府」，繼而北京也成立新政權，到了新年，分在重慶，漢口，長沙三處的國民政府，也迫於新事態而改組了。英美兵艦的被炸事件，和上海的租界問題，年末雖見緊急，但現在也算表面落着了。在第一期六個月內，是以戰爭爲主，挫華之武力的目的已算實現。宋美齡所誇稱的空軍，已受致命的打擊，中國全國的制空權，是操在日人之手裏，中國軍的損失八十萬，已失却積極的抵抗力。日本國的全民，均感到皇軍將士的忠勇辛苦。

第一期戰爭的結果聳動世界的耳目，華北則佔領内蒙，河北，山西，山東等省，南方則江蘇，浙江省的大城市均爲日有，包括北平，天津，濟南，上海，南京，杭州六大都市在內，鐵路的哩數佔有全中國本部之半。合日滿計，皇化領土的人口實三億八千萬，單從數量上觀，已算在日本歷史上爲民族最大的飛躍期。

在第一期是採「戰爭工作中心主義」，現入第二期，是爲目的達成上所必需之實力行使的繼續，與確保第一期的戰事結果之復興建設工作，及其他一般政治工作之遂行爲其特徵。第一期的活動爲單純的，直截的，而第二期的問題則極形複雜。在第二期的開始時，日本的國民。應暫捨下祝捷的杯而加以着實的考慮，遭着這樣空前的大事業，須具有絕不退轉的決心，與大陸經營的經綸。最要的前提條件，是在於事實的真相之把握，與一般情勢之正確的認識。缺於事實的直觀與趨勢的明察，則大經綸的實現成爲不可能。斷行的決意，反有成爲仇恨的危險。

鑑於日本國內的廉價報紙與一般非科學的人們之無反省的批評的橫行，站在事

變之第一線的人們，決不能安枕無憂的。這個問題是太深刻了，責任也太大了，應先對真實的討究上探着謙抑的態度，纔可論百年的國策。無論處着怎樣的非常時期，這種公理是永久不謬的。戰局愈展開，中國方面的秘密消息也愈加嚴禁起來，日國內的人民，是愈難洞悉事實的真相。且因宣傳的運動太盛，一見似乎真實的消息，仍屬難靠。以上所述的話，作者也不是認為絕對真實的，祇是以大致可信者為根據，而推測前途的趨勢。

二 蔣氏不肯屈辱的心境

這一次的事變，日本是與好幾種勢力相鬥，蔣氏是其中之一，中國的共產黨也是其中之一。對於美國在遠東的地位，是與以根本的打擊，及對於蘇俄的進出，則採迎擊之態。但直接當面的對手則為蔣氏。中國陸空軍總帥「民族復興運動」領袖之蔣氏，國民政府之實權者的蔣氏，雖在日本否認國民黨，並與國民政府絕交後，尚

成爲對手的存在。與蔣氏對手，非關講和與否，現在仍指他是屬隣接國的實權者。日本雖經承認北京的臨時政府爲正式政府時，而其政府支配地及殘餘的中國本部在事實上之隣接關係是存續，這是不能否認的。謂蔣氏爲對立的存在，那麼，究竟到了什麼時候，仍是存在呢？這是成問題的。（關於「蔣氏的持續力」問題，可參考改造雜誌本年正月號新進的中國研究家岩村三千夫所著之文）。但論到蔣氏存在至何時之一問題，若非論及抵抗日本武力進出之具體的蔣氏，則墮於抽象論了。從大乘的理想說，雖離却抗日的蔣氏之現象性，則赤裸的蔣氏也充分可成問題，但在現實的客觀情勢中，這是難成爲問題的。平心來說，現在祇是抗日的蔣氏成爲問題。其持續性論亦本此。

故抗日與蔣氏是不可分的。即蔣汪合作時之「攘外必先安內」的大方針，前年夏間經過和廣西妥協及年杪經過西安事變的結果，迫得轉換爲「攘外即安內」「安內即攘外」的新方針。對於以實力行使爲背景之日本的大陸進出，已不許以「攘外必先安

內爲口實，甘受中國的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之毀損。前年七月，二中全會的宣言，本認主權的侵畧不至當時以上的程度尙可，侵畧超過以上的程度時始行抵抗。嗣至西南和西安兩事件，則成爲「現存的主權毀損狀態要積極矯正」之約束（三全中會宣言）。西南和西安兩事件，是因蔣氏進行雜軍整理和剿匪的工作太過而起之反動的事件，兩事件結束後，國府的抗日策加重積極性者，實由於桂派和人民戰線派所迫而來。

蔣政權的長期抵抗的決心，在中國國內究竟有什麼源由呢？國內是有蔣氏的長期抵抗藉英俄的助力一元論，這已成爲共通的觀念。關於英國方面的援助之點，本文以後再述，倘若英國絕援則使中國屈服，這一點實爲拒絕日本求援的中國民族之一種屈辱。以上既說蔣氏之積極抵抗多由于國內事情，且舉桂派和人民戰線派，這兩者以積極抵抗或對日即時開戰爲方便的口號者，因知能得到較廣泛的智識階級和少壯軍人的同情，從而可以操縱輿論。至於蔣氏之不肯捨長期抵抗者，因以現在的

實力爲前提故不能捨，祇拿長期抵抗來做招牌是最安全的。以長期抵抗爲前提而生出主權擁護的問題，故又與國內統一爲表裏一貫的思想。（這裏所謂「國內的統一」，大體是有以漢族統一爲第一階段的傾向，至于內外蒙，新疆等邊地，似乎是暫且置之）。

皇軍在南京行正式入城式之早朝，蔣氏發出聲明，謂日軍一日對中國領土的侵畧不停止，中國的抵抗也一日不停止。這裏「抵抗不止」的宣言，似乎反映着在第一期中國的陸空軍實力喪失之狀，而漸入於第二期的戰畧之變更。總之，蔣氏之抵抗不止主義，是由於西安事變之直前，張學良曾對蔣氏說及「和日本妥協，而反使國內同胞自相屠殺之愚」，蔣氏得意地答道：「我的念頭，正在把華人對於自己領土的保衛力表示中外」，那種聲明之延長而來。

三 中國共產黨抬頭起來了

巧於利用事變而能抬起頭來的，是中國共產黨。自「八、一」的宣言以至西安事變直前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本已有秋風落葉的頹狀。由瑞金出走，橫行中國本部七千哩，在前年秋間，已使蔣氏發出「今後一月卽可以剿完」的豪語了。西安之「二、一二」的兵諫事件，是由於蔣氏的防衛疏忽而來，紅軍的戰力雖然不是可怕的，但「八、一」宣言之抗日統一戰線與抗日聯軍組織運動的將來，性是可怕的。以後一年有奇，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果然以北方爲中心，逐漸壓迫華中，紅軍竟由中央供給軍器和軍費，以陝西爲中心而作強有力的再編。是以在中國戰爭上最得到實益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八路軍，以後是當特別注意的。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先屈後伸主義。「七、二三」及「九、一二」兩個宣言，表示捨棄社會主義而反依三民主義，這非單屈服於國民黨，實在還兼顧到英、美、法、德、意等國的態度，當然是還經過第三國際和蘇聯的諒解，這裏也可間接窺見蘇聯的對華政策。中國共產黨爲中國內部的一種政治勢力，而蘇聯乃屬外部的一個聯邦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之華中的進出

，縱使不得蘇聯的援助也有可能的社會政治條件，中國共產黨與紅軍對日作戰時，蘇聯和日本間仍能維持漁業的協約及其他一般外交和通商關係。陝西方面和莫斯科的兩大中心，雖然與國民政府的接洽，是分出兩個方途，但此二系間的外交和政治工作，是能確實保持聯絡無疑。其顯明的例證，是在於「九、一二」的宣言和中蘇不侵犯條約之前後產出。

本來蔣氏與蘇聯間，在去年八月不侵犯協約未成立以前，可說是完全互不相信。中日在年之前，經過張羣和川越間數月的交涉後，也曾正式提及「防共協定」的問題。這個協定實在是阻止蘇聯的進出為中心目標，那麼，就可見蘇聯的感想是怎樣了。蔣氏在一九二七年間，是為共產黨的壓抑者，在一九三三年蘇聯所提議之商約改訂與不侵犯條約案，在蔣汪合作之下，未曾認為有一顧之價值，蘇聯的不信任觀念因此益深。張羣川越交涉以後的蘇聯態度，是冷淡的，當中國要求飛機和軍器的協助時，蘇聯似曾答覆以不訂不侵犯條約以表示誠意，各事尙談不到等語。蘇聯

對於態度未定的中國政府是未肯援助的，牠是視乎蔣氏的容共態度如何而定援助的分量，但援助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分量，是常更多些。蘇俄看透時機，命紅軍退出瑞金，而在外蒙和新疆接壤地方特設本部，其心境是在援助紅軍，以謀對華的伸張勢力。試想到綏遠的西半，陝西的全部，寧夏的北部等處蘇聯的勢力之進出情狀，便可見其對外政策的步武。

蘇聯對於蔣氏是出於警戒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對於寧夏，也是取攻勢的警戒的態度。毛澤東去年八月，曾任爲國防參議會的委員，但因對於蔣氏不信任，故未曾一次親至南京，常使周恩來爲代理。謂宋毛二人曾出現於江南戰線，這是人民戰線的傳言。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這樣，蔣氏當然也自警戒的。因爲英美法德的助力有限，是以贊成和蘇聯訂結不侵犯的條約，爲防止國內的分裂及反蔣勢力的抬頭之一辦法計，故毅然與中國共產黨妥協。又爲空軍的再建設計，故應宋美齡的懇求，甘受蘇聯方面的機員接濟。但仍未完全捨棄警戒的態度。

十二月初旬，蘇聯新任的武官朱加烈夫，路德虎二大佐，曾由莫斯科抵中國，均屬航空專材，當時提案，祇應允若是第八路軍使用，則蘇聯可以免費供給飛機八十架和機員八十名，這提案是為蔣氏拒絕。本年元旦，國民政府的政治機構改組，國防參議會增加員數，國民黨籍以外的人員頗多，這是可以豫想的，蔣氏一派的努力，是中國共產黨之政治和國防的關與，是以諮詢機關為限，其情形是歷然可見。但不論蔣氏怎樣警戒，而中國共產黨則除政治的部面以外，在社會的部面，其勢力實侵透大眾。日軍佔的領農村中，其地權自然被剝削，不在的地主之統制已經解消了。又紅軍對於武裝民衆，訓練民衆的工作，進行不遺餘力，其勢實漸強大，這是特堪注意的。

四 事變和德英美的態度

以保全中國之領土和行政兩主權之完整為名的九國公約之締約國，是各急於自

國的權益之維持。英、美、德、意、法等國的態度是各無異的。各國對於事變的對策，決不如日本人所估量的那樣單純。

先就英國來說。在這一次的事變中，日本生出一種反英的潮流，並非完全無根據的。英國對華保持一種「道義的援助」(Moral Support)，這是最近英日對立的根本契機。英國商人對華的軍器輸出，尙非根本問題。其所輸出的數量，實在和捷克國相比，究屬不成問題那樣少量的，即對於日本，也曾輸出數額相差不遠的軍用的高級機械之類及其他。並且英國銀行團對華的借款，也除了滬杭甬鐵路修築借款之百萬磅外，已交款者，自李滋羅斯抵華後直至現在，可說是沒有一宗。但所謂 Moral Support，實在是較於借款尤覺對華的援助上，更成爲有效果的具體性和積極性。如幣制的改革，銀行改革，通信宣傳工作，及其他等，凡屬中立的第三國所能供給的援助，應有盡有，其利益實不可枚舉。所以中國對於英，期望得到無限的援助，也屬自然的。

英國一向是承認滿洲爲日本的勢力範圍，而自己則以投資的關係，認中國爲英國的獨特銷場。英國承認日在滿有十億的投資，故滿洲事變初時以滿洲爲限，英國是有幾分承認日本的進出之意，但等到日本打到上海裏來，態度就急變了。又當日本對華北的進出，若不侵犯海關及其他英國的權益時，尙採靜觀態度，但到了現在，長江流域已受脅嚇，英遂認爲不能不有相當的覺悟了。並且英國是承認上海爲「自己的街」，故日本對於海關的進出，不能不豫備遭着英國方面強烈的反抗。

我承認英國在事變以前，是不願中國和日本開戰的。因爲英國在華之所求，第一是在商品和投資兩種市場之開拓，第二是在願到對於印度的統治和在華的權威之保全。英國對華的投資是有長期的特性，其利益之收回，是要中日關係的安定。爲增進商品之在華的銷場計，增進長江一帶的購買力計，及爲救濟中國之因軍費過大而致財政之反常的情勢計，其先行的要件，無疑的是在對日緩和。改革幣制的使者李滋羅斯，是欲使中國承認「滿洲國」，以圖中日關係的安定，這不是虛偽的。

但是，日本之大陸進展，在日本民族之客觀的條件賦與之下，不能不採東洋二大族相尅之現在的悲觀的特殊形態，這是運命規定的。英國所採的態度乃至方針，從西洋人的常識上說或許是合理的，但在東洋之實踐工作上，是缺乏妥當性。英國現在已注意到自己在華的地位根本動搖，日本在華進展的勢力可驚，欲壓止這種波瀾以保持自己的利益，所以順着大勢，採取感情的親華態度。英國爲顧及世界的方案計，應嚇使蘇俄由北方壓迫日本，說服德國，——如哈李佛士卿之訪德——以圖日本的挫勢，同時使德國表面試行中日的調停。但是，日本人所最重視者，祇在於英美兩國的聯合，倘使美國由檀香山以西，英國由星架坡以東，實行對日的經濟封鎖，這是日本最可怕的。至此，美國的態度之變化如何，實成爲重要性。美政府是不能忽視國內的孤立政策，自美國的國情而言，政府方面是不能服從輿論，美國輿論的特徵，是在於「非戰熱」對於中日的戰事，是採批判的態度。如對於十月羅斯福總統的演說，及對於巴納號兵艦事件等，一時雖覺輿論沸騰，但不久便下火了。不過中國

常向美宣傳日本的殘暴，這是能使美國輿論變化，日本是要注意的。

五 結論——新責任的醒覺

以上所述，祇是關於戰事第二期的國際一般形勢之素描。中國以津浦和平漢兩大鐵路分爲二部。兩路之東及北，現有新浴皇化之一大區域，有「蒙疆自治聯盟政府」「北京臨時政府」「華中自治政府」等運動。西南有不屈服之蔣政府，及將抬頭之中國共產黨。蘇聯是在北方窺伺，英國是引美法兩國共同防壓原狀之根本變更。第二期日本人的當面任務，可大別爲三：（1）遂行事變目的達成上所必需之軍事行動，（2）實行佔領區域之復興工作，（3）爲使第一，第二兩種任務進行容易之世界政策的實踐。第一種任務是有賴於將士，及一般國民的後援。這種任務艱難而且巨大的，總靠軍民的一致努力。近衛首相也曾說過：「我們在我們的時代解決中國的問題，慮及對於子孫的責務，故實行此大事業」。總之無論怎樣困難，這種確信和

決心是不可變爲狂亂的。事態進展，則第二和第三種任務隨而發生。第三種任務是對於佔領地的住民，要使他們能够早日得到善政，我們要可憐難民收容所的兒童，飢餓的乳兒，他們究竟有什麼罪過呢？雖在佔領地域的政權變更之過渡期，難免多少出於無理之舉，但克服這種無理，也不能不用強力，權道（即霸道）祇是一時的。須早給以平安的衣食住，爲實現明朗化的善政，不惜犧牲優秀的腦力和財力。日本的國民，須犧牲生活的一部分，以達到大陸經營的善政。東洋之盟主的真面目，如此始能活現。有些人是倡「南主北從」「北主南從」等論，易爲一時的權道所溺，難建百年的大計。中日問題已成久年的問題，極端的「分捕主義」，究竟是害人還是害己的。皇軍數萬之戰死，非爲飽滿爭權奪利者之私腹計，明朗的東洋和平之再建設，總要返乎天下之公道。（作者是同盟上海支局局長）

議會和戰局的收拾

馬場恒吾著

對華事變作日本的意圖發表之主要目的有三：（1）爲膺懲中國，（2）爲使中國反省，（3）爲實現中日提携。第一和第二兩者，可作達到第三國的一種手段看。近衛首相也曾說過，我們非以中國民衆爲敵，實以東洋之和平幸福，中日之親善提携爲必要，是以當然定出這三個目的來。爲達到這種目的計，已經開戰了半年，現在應檢討這些目的究竟已經達到某種程度。我們又說是已經充分達第一款的膺懲目的了。華北五省之重要都市已經全部佔領，上海和南京已經陷落，若中國認爲仍未膺懲，是中國自己的一種「空元氣」。但若問達到第二款的（反省）目的否，可說是尚未達到。蔣政權現時尙高唱着長期抵抗，此種高唱的聲浪，是否出於真意，抑祇屬一種虛勢，及能否長期繼續，均不得而知。究竟能否即時屈服，這完全屬於未知

之數。即使日方自認爲中國已經受膺懲了，而中國尙未反省，那麼，第三款之親善目的究竟尙未達到。雖則華北臨時政府所佔的地域中之自治政府，已表現提携的現象，但所佔地域非屬中國的全體，江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的大半之中國土地，仍在蔣政權的支配下，尙未沒落。欲和這些區域的民衆提携，其前途之目的尙屬遙遠。至此，則膺懲果屬親善之適當手段否，實成疑問！例如母親的懲戒子女，是一種手段，不能當做目的看，其中包含一種慈念。日本並無進攻中國全部領土之意，並沒有完全撲滅中國民族的力量，這就是日本屢次聲明沒有領土的野心之本旨。但中國已受膺懲而仍不明日本的意旨，這可說是低能的。不是膺懲不善，而是中國的頭腦頑鈍。現在膺懲已經充分了；不能不想及反省和親善之道。我相信中國一定到反省和提携的地步，但其中國尙有難關，這是基於中日兩國的國民性之差異而來。數年以前，我也曾聽過中國智識界的優秀分子說過：「日本人所做的事情，中國人是絕對不能諒解的。日本人的習慣，不是在入浴之後，全身均

暖，忽把冷水澆頭的嗎？這種心理，中國人總不能受！」我當時是苦笑，這個人是曾留學日本，通曉日本的事情呀！我少年也有冷水澆頭的習慣，現在已經停止了，這是年老使然。中國是年老的國家，日本是年嫩的國家，因此就生出國民性的差別來。日人的性格本來不是慘酷亂暴，但藏着溫和的心情，而表面似乎荒暴與冷淡。對華的真正目的雖在於親善提携，而因膺懲太過竟成徹底的戰爭。打後來講親愛，所以華人不能諒解。華人的戰法是在無抵抗主義，但未必便是弱。漢民族曾被北方種族的元清兩代所屈服，仰之為朝廷，但後來這兩代的異族主人，都因心醉於文化而呈衰弱，漢族復起而滅之。這就是「柔勝剛」的戰法。這非指華人將來能盡滅日本的戰勝者說，因為日本原來沒有統治領土而君臨之的用意，這一層是可不必慮。並且將來的國際關係，也和元清兩代不同，祇採侵畧和征服，實非國際關係的調製方法。世界的各國間，不能說是沒有「有無相通，共存共榮」的方法。人人當為發見此種方法而努力，異日必有發見的機會。那時決不用侵畧的主義的政策。

日本人的性癖，是從「逆取順守」的強者哲學而來。臺灣，朝鮮和樺太，皆是日本經過戰爭的結果而得到的領土。一旦爲日本領土，則日本官民努力爲這些領土的住民謀增福祉，沒有二心。即日本人之作風，是始初強暴而後來溫柔的。

反之，中國人是採「面從腹背」的弱者哲學。強敵襲來，一時不惜致歡迎的詞調，但一心忖着這些夷狄，百年後必被中華的文化所併吞。過去的中國歷史是這樣，這是一面真理。我不必斷定強弱兩者終局屬於誰勝，這裏但說及其中的異點。是以華人不解日人的真意，日人也不明華人的心理，基於雙方的認識不足，是以生出種種難題，原來可解決的也變爲不能解決了。

這種誤解之遺害甚大，華人長期抵抗，日人也不能不長期應戰，華方的經濟固益困匱，日方雖不及華方那樣苦，也是困匱的。各人遂懷疑到究竟爲何而長期戰爭？或認是因全中國播着抗日的意識，或認是因蔣政權繼續維持下去，或認是因久年的懸案未解決，不得不然。尤其是若二國長期戰爭，則國力消耗，祇有蘇俄從中款

喜。英至今是援華的，但若蔣政權難以維持時，可決英必無再援助的義狹心。嘴裏無論說着什麼，但英畢竟是實利主義的國家，單顧主義和理想而忘却國家的利害者，決不肯爲。英國的態度，一則不願日本徹底戰勝，以致稱霸東洋，威脅自己的利害，同時又不願中國赤化。實願日本不大勝，赤化的力量也不大能入中國。英人在這種天秤中考量，所以猶豫說他何日是傾向於何方面。因有這種臨機應變的態度，故極難知道英國的態度是何時變更。

畢竟中日兩國，實在祇是爲令蘇俄的暗喜而戰爭，因爲日敗則俄方安心，華敗則蘇俄又可以伸手入去。是以中日兩國，均可說是愚蠢不過。事變之初，蔣氏若能與近衛作肝胆相照的談話是可免這一次戰爭的災危，但可惜沒有這種機會。今戰爭繼續了六個月，這種肝胆相照的談話更難。但使二國停息此種愚蠢的長期戰爭，現時是比於初時還更重要。中日兩國的國民性雖異，但彼此都屬於人性的，互相表示真正的意思，息戰豈就沒有方法嗎？兩國若有真正的政治家則易爲。

說到這裏，則兩國的政治組織，實成問題，蔣氏固屬於相當的人物，卽近衛也是聰明的，但二人均屬當局者，卽使吐露真意，對方也疑爲外交上的策畧。國際間的諒解，是不能藉外交文書和公式的聲明而完全達到，可藉新聞雜誌等言論機關以補救這種缺憾。歐美諸國的國情，大抵可達言論的機關而知之。但在言論自由國的國情是易於得到諒解，而在獨裁國行言論的統制是不成的。英美法等國的國情，較爲外國所正當諒解者，實因這種理由。日本近年言論界未必自由，所以外國的諒解達至何程度，實在不明。

其次使外國諒解之責是在議會。在議會政治不失其健全的機能之國家中，其國情大致是可藉議會中的質疑與應答而可知之。各國政府，在將某事與外國談判之先，必先要得到國民的後援。國民不能納得之事，開始卽知其不能爲外國政府所採納。此事不必公開，祇令國民明白大體之目的原則，便生出國民的理解來，其次，外國也採理解的階段。

中國現在因爲沒有議會，這一次長期抵抗的政策，恐怕民衆未必盡明真理，外國也因而未能澈底明瞭。我們祇恐中國單趨於被困之途，日本則有帝國議會，果使日本的國策不能得到世界的同情，其責任一半是在議會。且日本的議會對於國策之決定，果已充分盡了國民代表機關之責任否，實屬懷疑。議會的現時方針，是在協助政府迅速貫徹事變的目的，這原不是全部不當的。徒因欲反對而反對之態度，現在已爲時局所不許。又他們對於出徵軍人，與以熱誠的後援，也屬正當。但他們對於使現政府成爲有存在價值的國策，使軍人努力於有意義的國策，及對於國策的決定上究竟有什麼貢獻，實在未明。大國策若不得到國民的後援是不能行。但他們果能明白代表國民後援的國策嗎？這種國策果經他們的參劃而決定的嗎？抑或他們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決定了，反而強令他們盲從後援呢？在我們門外漢的肺腑中，覺得這些分界實未明白，而議會的方針，祇是在後援政府！

現在第七十三屆的帝國議會又將開了。華方仍繼續無益的抵抗，日本雖欲恢復

東洋和平，也不得不長期抵抗。但列國往往同情於華方而責日本，這時候議會曾經質疑問答使世界知日本的眞意之責。再進一步，對於戰局的收拾上，還應代表國民確立一大方針。不應以受政府指導爲能事，應有指導政府，進而指導東洋與世界之抱負！

『長谷川和山本實彥對話』

山本實彥是敵國一個著名的報界人物，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和今年正月三日，曾兩次訪海軍司令長谷川於出雲艦談及我國飛機常常轟炸該艦的可怕情形，並無形中表白該艦常藉該艦常藉外艦掩護的醜態；同時還談及種種軍事詭計，與在華種種情形。其中最可驚的，是鬼子對於我們中國一般人物和地理等，怎樣熟悉，可見每個敵人，都是準備侵略有素了。所以特地對話的內容著實譯出，以備我國人一般的警惕。對話中還有一位一原道常氏加入，他是東京改造雜誌社的特派員，也和山本氏一同訪問長谷川的。

譯者附記

（山本）我今年（指去年說）已經來華四次了，這一次聽到美國巴納號艦被炸的事件發生，司令恐怕是很耽心的罷？

（長谷川）呀！這一艘戰事着實難幹！因為華在英美的會社那邊把迫擊砲打來，這艦的砲，因為砲身長長的緣故，打回的砲彈，都被外國會社所阻，真是沒法。

(山本)聽說日本在江面埋伏的機械水雷，多被漂去了。

(長谷川)確係漂去了，但昨天楊子江起回了很多。

(山本)黃埔江方面怎麼樣？

(長谷川)這裏已經是沒有了。但外交上却更要耽心，動不動就牽涉第三國的權益。

(山本)英人在這一帶(指上海方面說)的歷史還不滿百年，不想他們的建築物已是這樣多了！

(長谷川)他們真能幹！日人約有二萬五千左右，但除了所經營的紡織會社和本國大會社支店外，均仍是以本國人為顧客，此外如電車、水道、電氣等，都沒有着手經營，實在是令人覺得不足。

(山本)上海的日本菜館，祇是兩個人食「炸魚」一味，都要費七八塊錢，不是很好做的買賣嗎？

(長谷川)專辦和日本人交易的菜館，總不如辦和華人及外國人交易的菜館，就是日

本的鍋燒牛肉等，西洋人也贊成。可是總要蓋起二三層樓的洋房來，可是日本人沒有這樣財力！以日本下級職員爲顧客的菜館，現時是有的，華洋人也會來，誰也不能不認爲要和各國的大衆對手了，可是非財不行！

（一原）這艦（指出雲艦說）是沒有駛出港外灣泊過一次嗎？

（長谷川）一次都沒有。

（一原）困在艦裏久不上陸，不會生出腳氣病來嗎？

（長谷川）不怕。有人問我，這艦常被炮彈像雨點般襲擊，爲何仍老都在此不去，我答道因爲日本僑民有六千人在這裏，不能因炮彈打來就跑掉。倘且外國的艦常有交涉，離開這些也不方便。

（山本）老都停在這裏頑抗着，一粒炮彈都沒有打中嗎？

（長谷川）這真可算是靠神助了。但飛機到來，我們祇得閉口罷！最初，當食中飯的時候，有飛機來了，晚間入浴的時候又來，我想裸體而死，真是武人的耻辱，

所以趕緊穿回衣裳了。夜間也不敢着睡衣，祇仍着軍服。最近夜裏沒有空襲了，但初時我是祇脫上衣，穿着下褲，其後連上衣也不敢脫呢！

（山本）蘇聯有相當的飛機到來中國罷！

（長川谷）實有相當之數。這一次中國可算最錯，是過信飛機。中央軍確比從前強得多，但日本的陸戰隊等到正式的陸軍到來以前，已解決了。中國欲以飛機在吳淞江解決日本的陸軍輸送船，但因日機佔優勢，漸被擊落，那計劃竟成畫餅。開戰之初，上海的周圍約有華軍二師，日本的陸軍來後，增援至五師，他們似

欲藉此解決日本的陸戰隊。

（山本）日本的飛機，飛到蘭州去的，究竟怎麼樣？

（長谷川）那些都是水機。但因距離既遠，山又高，並且越飛高越冷，真是很苦！

（山本）的確是很苦的！

（長谷川）日本的作戰，首先以解決華機爲大成功的基礎，倘若華機佔了優勢，那時

就不堪設想！這兒已經把華機的停泊場解決了，是一件安心的事！

（山本）總之，華軍是豫期在一兩天之內便解決日軍，却遭着陸戰隊的頑抗，是這一次上海事變的經驗。

（長谷川）那也因中國的兵士是多鄉間來的，反覺日軍方面更熟地理之故。

（山本）我（山本自謂）去年，今年，連明年計算在內，可算是在中國過了三次新年，前一次新年，曾由現在扣留中的蔣方震氏設宴款待，我也回請了他，其時大川內司令和本田少將也在內。……你認識那青紅幫的首領杜月笙嗎？

（長谷川）識得。杜前次曾往香港，現在聞得已經回來了。

（山本）杜月笙是有許多乾兒子的，很有勢力。蔣氏革命的時候也曾利用他，就是張學良在西安事變的時候也曾和他聯絡呢！

（長谷川）聽說杜月笙是有乾兒子幾萬個呢！

（山本）這一次如要實現上海復興的計劃，恐要費相當時日罷！

（長谷川）那是一定的。

（山本）在上海的漢人，這一次跑到香港去的很多罷！

（長谷川）那些到青島和香港去的，都已經回來了。

（山本）我今年八月到華北的時候，也曾經過青島，所見那裏的婦孺已，祇有經逃了

男子留着，那裏恐怕就要開戰罷。

（長谷川）要想取就馬上可以取的。

（山本）頑抗是很好，兵艦現時很多駛往華去嗎？

（長谷川）沿岸現時封鎖着。

（山本）楊子江一帶的江面如何？

（長谷川）因是在水中，究不知何處有機械水雷，但小砲艦或驅逐艦，是可以駛到蕪

湖去。

（山本）我在華北的旅行真苦，乘着無蓋的車子，搖搖盪盪地行了十二小時，就是小

便也不行！去的時候乘着無蓋的貨車，回來又是兩個人同坐一張椅子，苦煞了！正抵塘沽的時候，正遇着通州事件發生，從播音聽說天津和豐台的日軍全滅了，我們搭船的時候，纔知道那是南京的播音。

（長谷川）那種播音，是由一位日本的大學生出身的周文彬用巧妙的日本語播音送出來的。那恐怕是和飯碗問題有關係罷。

（以上是去年十二月廿九日的對話）

（山本）今天（指正月三日）海軍是休息嗎？

（長谷川）機關槍的人員仍照舊配置着。

（山本）是嗎？昨天有什麼事呢？

（長谷川）華機有五架來南京，從高空擲彈了。但這裏飛機往南昌，擊落一華機，擲彈燒着機場。

（山本）蔣氏現在漢口嗎？

(長谷川)大約是。

(一原)華機共有多少呢？

(長谷川)百以上。

(山本)中國是否受着蘇聯的相當接濟呢？

(長谷川)不明白，聽說是有不少的蘇聯的機員。

(山本)昨天這裏沒有受重大的損失嗎？

(長谷川)祇在機場外和艦的近邊落了炸彈，沒有多大的損失。

(山本)這是華軍第一次來南京攻擊的嗎？

(長谷川)是，這是第一次來了。

(一原)現時攻守的形勢轉換了，今天天氣頗佳，日軍應該出動的了。

(長谷川)深入華軍的內地是很難的！

(一原)華機是否有蘇聯機師駕駛呢？

(長谷川)聽說是有的。

(一原)由蘇聯的機師駕駛的華機，是否被日本的水機追趕呢？

(長谷川)雖有海軍擊落俄機五十架以上之說，但俄機究竟有多少，實在是不明，或

說是二百架，或說是三百架。

(一原)俄機的性能，是不是較日機更優異？

(長谷川)這一點未明白。

(山本)關於中國的智識階級之指導上，有何高見？

(譯者按：這是對於高等漢奸的發縱指示說)

(長谷川)這是很難的。今天英字新聞登載，有自治委員(即偽組織中之一人)一人被殺了。故欲有爲之人，反加以叛逆的烙印。他們是應設治安維持會，講求以華治華的方策，但是現時的空氣壓迫之下，是很難做到的。總要更有民望和更有力量者出來，但他們一出，竟被指摘爲漢奸，真是弄得沒法！

(山本)大約是有這種困難情形，但時下還有什麼解決方法呢？

(長谷川)相信經過相當的時間，將能解決一切。

(譯者按：若經過相當時間，不特漢奸將無噍類，連敵人也將無噍類了！)

(山本)現時南北的宣撫班，都說農民刻下甚困，不能不先從救濟上着手，但有些人

又說第一要向智識界下手撥動，究竟以那一策爲高見？

(長谷川)總要雙方併行的。

(山本)即欲撥動智識界，也被華人狙擊，現時北京的委員會中，不是人人受着迫脅

，有岌岌自危之勢嗎？

(長谷川)報載陳覺生已死了，確否？

(一原)真的，那已很早的事了！

(山本)有人說蔣氏的勢力已經下火，但照漢口的情勢看，這種推測是不中的。對於

蔣政權的高見如何？

(長谷川)我們祇顧打仗的，不說什麼，但蔣政權不像日人想像那樣的下落，祇是西移了，但不像以前的軍閥那樣擁兵自衛的。

(山本)你在這裏停泊，也覺得華人海軍方面，有值得敬服的人物嗎？

(長谷川)可認為實在有相當的人物。例如前海軍次長李世甲，是頭腦明晰的人，卽如部長陳紹寬，也是莊重的紳士。

(山本)周作人從前也前入海軍學校，比起陳紹寬應該還是前輩。他是文豪魯迅之弟，娶了日婦，在海軍學校因爲眼有毛病被黜，如果他現還在海軍方面，必然達到相當的地位。有人推薦他爲北京文化工作的中心人物，他辭以不適任，未肯相就。

(長谷川)是嗎？

(山本)薩鎮冰尙健在嗎？

(長谷川)近來在福州的鄉下，做社會的慈善的事業，地方人士視之如神明。年齡已

到八十了，但在福建省內的信望，可說是在省主席以上，可算偉大的人物。

（一原）引他出山如何？

（長谷川）現年已老，和日本的西鄉南洲（即西鄉隆盛）有同樣高潔的人物。他做海軍總長時，把薪金藏在神龕中，趁他的夫人不在家時，拿出來和秘書們自由費去。中國人做大官的，他可算是一位很有人格者。

（山本）你曾和薩氏會過面嗎？

（長谷川）近來到福建的時候不會會面，但三十年前，他曾以艦隊司令官的名義來訪日艦時，我尚記得他。他已做過海軍方面的長官十多次了。

（一原）就海軍方面說，中國的海軍規模雖少，而優秀的人物是比較的多。陸軍方面雖說不大有統制，但因數量既多，也自然有相當的人材罷。

（長谷川）這一點蘇聯也是同樣，遠東方面可說是無海軍。祇有驅逐艦、潛行艇等，大約集中海參威罷。

我在中國陸軍方面是見過何應欽，他是溫厚的人，在國內的戰爭上是常勝的，可見他是善戰，日語也說得很好。

〔山本〕他演說時每每聲淚俱下，現時軍校的青年對他似不甚諒解。陳誠氏的人物如何？

〔長谷川〕他是陸軍次長，但敗仗祇是自這一次始罷，他是強戰的，人認他將來是會統率陸軍的。他在滬中央部有部隊，現時似在南方。

〔山本〕但從風格上說，似當推白崇禧。

〔長谷川〕我不知道白氏，但在粵時曾見過余氏。

〔山本〕關於上海的復興，如果不設法使以前在上海居住的平民及早歸來是不妥的。

〔長谷川〕現時是本着這種方針去做的。此間也因民船的不足，竟用海軍的船去運載。

〔山本〕准華人入去尙太早嗎？

（長谷川）本應是要准的，但入去就發生麻煩，總之不許華人入去什麼都不能做，因為復興的工作，房屋的修理，泥水，工匠等，大多數是要華人。

（山本）是的。昨天我到了自然科學研究所那邊去找書店，見到街上有很多美人，電燈也着，但回到這裏却見電燈也暗，街上沒有美人，真是太過寂寞！

（長谷川）現在已算好了。十一時後是燈火管制，交通不便，自然是這樣。我們也是要趕要恢復原狀的，但還要種種準備呢！

（山本）我所見各書店裏，華人不肯進來，總是不成買賣！

（長谷川）運物和洗衣，都是要華人的。逃往近處的華人，是即刻回來的，但逃到遠處的，因為交通路絕，欲歸不能。但現時是設法想早准華人入來，豫備有什麼事件發生時，除用警察彈壓壓之外沒有別法。

（山本）我現所住的豐陽館，與及日人的書店等，原多雇用華人的，但事變後逃了尚未回來。雖接到他們從各處打電話來，總是不見面，或許是要看看光景怎樣

罷。

(長谷川)西洋人也祇是空着舖店，沒有華人回去，什麼都有法子可想！

(山本)英人總不肯捨棄上海的，要想和日本妥協，日本爲不許華人回到上海，那麼的復興事業一定遲了很多。

(長谷川)自然是相當遲的。

(一原)此間的燈火管制，不是漸見弛緩的嗎？

(長谷川)不能盡弛，但已經是漸漸明亮起來了。

(一原)日本的軍事，結局到了南京算止步罷？

(長谷川)還不算止步，日本的飛機，不是渡過大洋去炸擊的嗎？

(一原)我猜華機，也許是飛到南京算止步了。

(長谷川)他們有勇氣就能來，日本已經盡量出力，不論到了那裏，都要打通佔領地，但因此則惹起報復來。

〔一原〕上海將來不能築一海軍港罷。

〔長川谷〕是的，中國大動脈是在長江，沿江流域，是養活三萬萬的人口，因此，上海一個港口是永存的。

〔山本〕若中國繼續抵抗下去，日本要怎麼樣辦呢？

〔長谷川〕那時有那時的辦法。

〔山本〕英國在某程度是助中國的結局是使蘇聯的勢力膨脹，中國共產黨也大起來，豈不是麻煩的嗎？關於這一點有何高見？

〔長谷川〕現時尙未得到切實的辦法。……以前雜誌（指日本的雜誌說）上每多用「○○○」的字，近來畧有改變沒有？

〔山本〕最來已說不可多用「○○○」的字了，也曾和當局談過。中國種種的雜誌，是多登日本的消息，而日本的雜誌則不許登載敵人的長處，及敵人的評日本的戰畧戰術。本來登載是好的。但日政府關於對外問題，往往壓迫智識階級及一般

國民，這是大應考慮的。

（長谷川）是的。

（山本）想到將來中國的敎育變成這樣的抗日陣容，日本方面也要作對應的文化工作和教育政策。我所認識的華人，大抵已經往漢口和重慶方面。我是常由華人方面得到調查的端緒，但現時在這裡是。得不到甚麼的調查報告。要來見我們華人是我不大想見的，他們祇說空話，要想不到毫無隱藏地的華人已經是沒有了。

（長谷川）這大概也是因為他們的身邊危險罷。關於財政界，曾會過什麼人呢？

（山本）我對於財政界的事情是不大熟悉的。

（長谷川）郭沫若在這裏嗎？

（山本）是在香港。他因為聽官不大靈敏，不便在於第一線活躍，常以寫作爲專門，他家裏原是四川的豪農。

(長谷川)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嗎？

(山本)是的。我在上海招待報界同業者，把中國的智識界讀書傾向問及他們，那個內山書店的經理對我說道，該書店以前的顧客，華人還比日人多，現時却沒有一個華人交易。但雜誌如改造，中央公論等，無論華人日人都買，這一點不能不極注意。這間內山書店的書，多數是掛賬賣出的，等到年底總結賬，可是因一次事變發生，大多數乞了賬。以前上海事變時也是這樣的。

(長谷川)是嗎？

(山本)有人說現時華北已成日人的勢力，理應趕緊振興工業的製造品，可是，也應考慮到種種條件罷。

(長谷川)一旦有事發生，非在日本的勢力能充分保護之下不可。若在山西的內地製造，運費一層，祇是製造品的運費，還是可以的，但一旦有事也不能不逃，結局仍非日本勢力所及處是不能繁盛。

(山本)郭沫若的着書裏頭說道，把日本的紗廠破壞，華人也可以乘機在內地自設紗廠，以防止日貨的侵入。

(長谷川)華人大抵是這樣着想的。

(山本)但無錫方面的華人產業，已經完全破壞了，華人的復興不是阻遲了嗎？

(長谷川)和平若是繼續，則日人可以入內地經營，但一旦有事則危險。青島方面，

日人原採「就地保護方針」，但現在一概都毀了！

(山本)這是很大的一場損失罷。

(長谷川)聽說是三萬萬或二萬萬五千萬元間，但這麼看來，日本人已經可算是在各方面都有相當發展了。

(山本)中國報紙上說，日本陸戰隊已經在連山港上陸是嗎？

(長谷川)不確，祇有飛機到了。

(山本)那港大船可以進去嗎？

（長谷川）不能進。

（山本）如果築了港口怎樣呢

（長谷川）如果築了港口，大船是可以進去，現在祇有三千噸以下的船纔能進去。

（山本）盛傳黃河口也要築港，是有這一回事嗎？

（長谷川）很難的，經費太大。……黃河可算一條大曲河，但大水一來，則全部又變

成一直線。祇有長江可算大河，由上海至漢口間，一萬噸的船可通，但至重慶，祇能用砲艦。世界上實沒有這樣的河。

（山本）長江的深度是沒有變的嗎？

（長谷川）是常變的，一部分常常要掘。

（以上是今年正月三日的對話）

現代日本的思想形態

船山信一著

本文的題目，叫做「現代日本的思想形態」，並不是作日本全體思想的一個鳥瞰圖，也不是指出現代日本最大思想的潮流，或這種潮流中的思想內容。目的是在檢討現代日本思想的一般形態，性格，先拿本文的結論來說，是就以現代日本之「思想的貧困」或「思想性的稀薄」為本文考究之對象。

先從雜誌和報界方面考究這種「貧困」的實相。或有人反對，以為雜誌和報界究不能代表一般思想的動向。但我特從這方面檢討，是具有二理由：（一）因為我們畢竟是市井之徒，不能升進學究式的殿堂，也不能直敲思想指導階層的密室之扉，並且到了那種階層去，大眾一般潛在思想之傾向，也未必便能明白。（二）雜誌和報界近來無論怎樣變質，總是多少能盡了「社會之鏡」的任務，故可作思想形態之反映

來把握。

所謂現代日本的報界乃至具有高級綜合性的雜誌，對於思想形態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現代之一產物的新聞，雖不限定是某一政黨的宣傳機關，但總是某一社會團體乃至某一思想團體的宣傳機關。根據這種意義來說，則新聞的本質，原屬是政黨的了。無論在思想上和意識上，總是站在一定的立場，紙能使報紙有徹底主張，及生動有力，否則變作乾燥無味。這一點可是對於世界大多數的報紙可認為妥當，祇有現代日本的報紙，却可算屬例外。日本報紙的一般趨向，是很不喜歡令人認出是具有政黨的色彩，或作某種「御用報紙」看待，到處是以「不偏不黨」四字為標榜。

不過追溯日本的報紙之發軔時，也並不能說是完全缺乏黨派性，祇是那種色彩不大顯明罷。我們不必追溯到明治維新以前的自由民權運動時代，即直至最近，日本的報紙還是保持若干的黨派性。

思想性和黨派性原非同一的。我們是應希望為單一性，全體性而實現，但總是

理想的。全體性和單一性與其說是存在，不如說是招徠，現實上的思想性，應作黨派性而表現，思想性的缺乏，即成爲黨派性的缺乏之姿。但我這裏所說「思想的貧困」，並不是說特定的思想之退潮，却是指一般的貧困說。那麼，所謂思想貧困的例證，究從那裏看出呢？

現在日本的新聞雜誌，是過於向「時局的適應」上追求，結局是變爲新聞本位的，政治經濟本位的，遂失却重要的思想性了。本來爲時局的了解起見，經濟和政治上的分析，乃屬思想之把握的前提，這一點我亦承認。但是，徒藉政治，經濟，的分析，是未能得到時局之全面的理解呀！政治，經濟，的分析，祇爲思想光明的前提，倘若政治，經濟的議論太多，還不是思想貧弱的一種證據嗎？不論那一種雜誌，祇是集中於政治，經濟方面的分析，而思想上的論策，却屬寥寥可數。縱使偶有涉及思想的論文，但其構思也很淺薄，祇是流於情調的。時下的雜誌，雖能滿足一般讀者的新聞慾，却不能得到一點古典的意味，這即是思想貧困之一證。從新與以

思想的內容，正屬雜誌之最高的時局任務。

我們現在縱不便於再深追究這一問題，但也總須理解思想的獨自性，也即是應把握着思想之哲學的概念。單單承認思想是對象的摹寫，社會基本構造的反映，即認為對於思想的本質已盡，這也太單純的。單純經濟關係是社會的下部構造，政治是經濟之集中表現等單純理解，即是思想的理解之淺薄。

三木清氏在中央公論第五十二卷十二號發表有日本之現實一文，裏頭也曾這樣說：「日本現時所負的課題，常有種種，如政治，經濟，文化等。我現時特拾起「思想的問題」來，也即是「日本思想之現實」的問題。但思想決不是局部的問題，政治，經濟，文化，均和思想問題有關，這是現在的一般常識了。即如這一次的中日事變，也是一個重大的思想問題。」我對於日本有數的思想家中之一的三木氏，常常提及思想問題，未嘗不表示敬意。但想把他所說「政治，經濟問題均和思想有關」一語，改爲「均以思想爲中心」；又他所說「中日事變，也是一個重大的思想問題」，

也應改爲「以思想爲最重要點。」總之，把思想特別輕視，其一半的責任，是在主張唯物史觀者，祇視思想爲上層建築而來。太過重視政治，經濟方面，而輕視思想，時或忽視其對於文化的獨自性。三木氏對於以上所說的話，又曾再加解釋如下：「人們每每說及，日本對於中國的目的，是在於以後的親善和平。目的確係不外如此。問題祇是在既具有這般中日親善的觀念形勢，究竟應該怎樣使牠具體化？又應該以何種內容的思想爲基礎，而確立東洋的和平呢？」這樣說來，就可充分看出日本思想貧困的佐證。現時的雜誌，對於中日的事變說話實在不少了，可是，我不能不歎他們對於思想上的理解完全缺乏！

我這樣專指着雜誌方面來歎氣，或許是太過注重雜誌，但是，雜誌上的思想之缺乏，也就是社會的思想貧困之反映！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方面，又安得不貧困呢？思想貧困之實情，實在遭着這次的事變而益顯露。日本在現下是最需要偉大的思想生產呀！正在這個機運，不能不令我來斥責思想的貧困，寧不是一件最痛心

的事嗎？這一次的事變無論從思想上得到適宜的或不適宜的解決，都可算是日本的運命之決定。

日本在一次的事變中，第一是要能忍耐經濟上的負擔，即中國方面也是這樣的。如果說中國的政權將要崩潰，這真是近視眼的話！總之，從這種經濟意義的眼光來看物，是有一定的限界。若祇向本國以內的經濟來打算，問題仍是小的。但從今以後，對於中國的問題要怎樣處置，這便成爲經濟上很大的責任。尤其是在戰事結束以後，對華的經濟問題，跟着尙有政治問題的對策，那就大到不可思議了，現在暫且擱下這一點不提，單說現時對於中國的思想工作之缺乏，已是一個思想貧困的明證。本來對華的政治，經濟的工作確係很大，不過人人既知其難，而在少數人所提出的積極的對策之中。往往非根據現實的正當的認識，是以總難於施行。並且其中往往忘却這一次事變在思想上的意義。

或許有人提出反對的論調，謂現時日本對華，決不是缺少文化上的對策。但我

不能再請他們仔細考慮文化和思想的差異處，文化祇可說是表皮的，末梢的，而思想却屬根抵的，莖幹的。在思想的對策不一定有文化的對策，沒有思想的對策時，文化的對策也可有。反覺因沒有思想的對策時，而以文化的對策來補足之，修正之，這也屬可以的。主張「中日提携必須經過文化的路徑」，這是大有意義的，我還是盼望今後益重文化的工作。最可惜者，現時雖覺稍有文化的對策，但非以思想的對策爲土臺，祇爲思想的對策缺乏之現表！不以思想的對策爲根據之文化對策，是無多大的期待性。文化的對策祇是未稍，灌以活力使成爲大樹者，是在於思想的對策。不幸日本對華之思想的對策未經確立，誤認文化的對策卽爲思想的對策，實貽將來無窮的禍根！

對華的思想對策之確立，實爲對華的政治，經濟工作之前提。有時問題或可單限於華北、上海、乃至經濟、政治、文化等對策上，但關於全中國之思想的對策，是絕對的。自前年以來，議及日本的文化 and 思想的人，已漸漸多起來了，但問題仍

是在「全體的日本之究明」。全體的日本，以前是怎樣呢？現在是怎樣呢？將來的成行是應該怎樣呢？不幸積極主張「日本主義」者或批評「日本主義」者，均未能提出全體性的日本來。前一派祇從西洋方面區別出日本來，後一派祇將日本折爲若干要素，發見其與世界共通之點而止。兩者祇能見到其質的片面，失却全體性。作者非單主張批評，端的是要求日本的文化思想。

但向來的日本精神，對於這一次事變的思想試煉，果能堪當至何種程度呢？三木氏在前述之一文中，也曾有如此的說法：中國事變至少是明白地教訓我們一件事：即是向來單舉出「日本的特殊性」之日本精神論，至此將遭重大的限界。因爲那樣的思想，不能爲中日提携的基礎。日本有日本的精神，中國有中國的精神，結合這兩者，須爲超越這兩者的東西纔成」。這些話頭雖不得算是新創的，却很值得注意。

要以日本的精神包括中國的精神，這是什麼意志呀？是不是以從前包括日本本島的狹小領土之同樣思想，再進而要支配中國呢？決不是的。日本主義之亞洲主義

東洋主義化，不是日本主義之支配地盤的單純擴充，却是其質的發展。視爲單純之量的擴充，乃屬過去之誤。日本主義之亞洲主義的量的發展，究竟是怎樣？是不是單在中國精神和日本精神之妥協，折衷呢？但問題仍是在更深之處。中國的親善非單由東洋的精神可以徹底實行。因爲現在日本已非單屬東洋的日本，是世界的日本。可說日本實爲世界的綜合點。日本的偉大處不是常以東洋的爲止步，早已成爲世界的了。故日本是比於中國更爲非東洋的。中國的後進性，是止於東洋的一階級。淺野晃氏等常說：「日本對於中國的長處，是在中國止於東洋的，而日本早已進於西洋的。」這話是全體真確。那麼，從前的日本精神觀點究竟怎樣，可以不必再追究，但將來的日本精神，若仍爲東洋的精神之轉化，那就不得算爲發展，祇可說是退步。現時東洋主義，非特日本認爲不足，即中國今日，也非屬東洋的中國，故欲包括西洋化的中國，若祇爲東洋化的日本，當然是不夠的。

現在姑且把「東洋說」問題暫擱不提，總之東洋的精神，是不足爲中國親善的

基礎思想，即爲西洋化的中國，若欲使其返於東洋化，故屬不可能，亦非所望，所謂日本思想的貧困，即是指對於日本課題解決上之困難說。現在中日的事變已引起舉國一致的注意了，但同時還要引起思想的自覺。雖則本能是比於思想更強，沒有本能的思想終是設有基礎的，但沒有思想之本能，更屬不安。欲舉國一致地奠定永久的鞏固的基礎，非有思想上的自覺不可。本能祇屬於直接性，而思想則經過媒介與否定。今次的事變無疑的實爲日本的運命之決定，但同時又要顧慮今次事變的思想問題之重大性。單把今次事變的重大性從口舌上說來說去，不如加以沉着的反省而能理解。今次事變要從思想上把握，這纔是我們的重大的任務。本文所指摘的思想之貧困，同時也即是指出其間的任務之困難與偉大。

對華文化政策之明日

上崎孝之助著

一 文化事業的意義

文化事業或文化工作的問題，可從以下兩種見地來考究：即當從其與政治指導原理的關聯上及與經濟政策的關聯上考究。政治和經濟，縱使認定任何一方是具有較高的比重而與以決定的價值，但兩者祇是從整個社會有機體的生活上不同的角度來看察，兩者究非截然為個別的存在。故關於政治指導原理的文化事業，與隨着經濟政策而展開的文化事業，其由來的本質是同一的。這種分類，祇是令複雜的問題變為單純化，為現實的正常認識和將來不誤的展望之便利計。

對華的政治指導原理為何？這單根據日本政府對於今次事變所聲明的態度，與在事變發生前中日關係的經緯，自可規定。但欲使其指導原理成為現實化，可為國

交整調之機楔，那就非屬客觀的，爲華人所能接受而發生共鳴作用者不可。關於此點成爲問題者，是國民黨永年宣傳，昂揚至於民間信仰的「三民主義」的指導原理。

三民主義是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主主義爲支柱的西歐之民主思想，其社會科學的內容，大體是爲十九世紀及歐洲大戰以前的思想體系。民生主義，實爲資本主義興隆期的資本家的觀念形態，從某意義上說，識者認爲在資本主義繼續修正的今日，這種民主主義也跟着有修正的必要。尤其是國民黨的人士所理解和實踐之民族主義的概念，與其說是文化的概念，無寧說是與十九世紀的政治概念相近，且順着民族，民權，民生的次序來說，也是犯着以民族爲第一位之嫌。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既有這樣的脆弱性，今竟墮爲抗日的思想，實爲人民陣線派的蘇俄主義所利用之原因。

故關於對華政治指導原理之具體化，當對於三民主義加以徹底的再檢討，在其基礎上建樹新的思想體系。說到政治指導原理之再建樹，當採以上所說的文化政策

爲大題目，以爲政治機構建設之前提，或與之併行。

從悠長的排日歷史上觀察，中國政府和中國的智識階級，其所以抱有與日本不同的政治思想及敵對行爲，從而煽動民衆者，實因具有上述的根抵很深的信仰之故。指正這種智識之錯誤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概念，實爲日本當前的最大課題。這是需要以人文科學爲研究的重點，注重於教育設施，同時還需設自然科學的研究機關，以中國的風土，地質，生理衛生等爲研究上的主要對象。

與經濟政策相聯關的文化事業，隨着歷史的條件之變移，其自體已是變質了。文化事業之本來的使命，是在於人道主義理想主義之下，使文化和生活水準很低的人民，得到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向上。國際的文化事業卽是對外的文化事業，是與殖民政策相結托而發達的。重商主義之誕生，使列強努力於殖民地的開擴，其所採之文化政策，是與此相應，而爲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的理念之發揮。在列強的殖民史中，是有許多美的插語，例如醫生和牧師等基於人類的博愛的精神，而作殉教的活

動是。

歷史在其發展的過程上，每一轉化，往往成爲一種反對物。與資本主義共成激烈的列強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之進出，遂棄却文化事業的神聖精神，其空虛的形骸，漸成爲自己的經濟爭逐上之便宜手段。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中，列強的文化事業裏秘藏着許多政治經濟的野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事業在是已經顛落了。日本對華文化綱之重建的大課題，實在於當如何再建起這種已經顛落的文化事業？

文化事業和經濟利益並非互相排斥的，實可成爲相互的依存關係。這一次的事變後，當從兩國的文化 and 經濟提攜上努力。兩國經濟提攜的成立根據，是在基於資源關係之兩國分業，與緣分業上成爲兩國有無相通的善隣關係。即是日本以重工業，輕工業的商品提供中國，開發中國的富源爲各種工業原料，以分潤中國的人民，日本商品之在華的銷場，應與由文化建設之中國人民的文化生活線共同拓展。這是

經濟和文化的相互依存關係之第一着。

說到第二着，則爲教育普及以後的技術進展，而生產力的擴展隨之，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要素。這樣幹下去，經濟和文化是完全融合，在兩國間不單成爲抽象的理念且成爲具體的實現。

最後，我們還要簡單地論及文化事業的經濟性。卽是，文化事業究屬於生產的，抑屬於浪費的？利潤是由工廠的生產品之販賣上得來，而文化事業的設施，是促文化生活的充實與向上，使慾望隨而增大，成爲商品的銷場開擴之誘因。他方又因文化事業促成技術的進步，擴大生產品，從而增加利潤。準此，文化事業雖非屬直接生產的，却屬於間接生產的。

二 中國的文化現狀

中國一向因屬於內亂和革命相連續之故，割據的軍閥們苛斂無厭，致使國內的

生產力荒，民人憔悴於虐政之下，死活不得，即斷片的文化生活也還享受不着。當在資本主義的黎明期，列強的經濟之進出，使其完全陷于半殖民地的窮蹙狀態。農工階級簡直過着非人的生活，教育，保健，衛生等設施之重要者，大都是藉外國的資本營着。綜合本國政府對於文化事業建設之貧弱性與依外性而論，實演成中國之半殖民地化半封建化的文化事業之二重特性。一般的列強，在中國所經營之文化事業，差不多沒有例外地是以博愛無慾，爲其經濟侵畧上的假裝手段。以一九三一年的統計看，英國在華的公益事業費爲四八〇〇萬金元，美國則佔三五〇〇萬金元，美國祇在絕對額上較少於英國，而在投資總額上所佔的百分比，則超過英國。對華的進出較遲的美國，固在文化事業佔着優勢之故，是以特主張「門戶開放」的自己存在的理由。

在華諸國的文化政策之開端，實始自傳教運動，基督教新教的活動(Protestant movement)，實自一八〇七年開之；羅馬教會和新教會的教堂，實蔓延全國。藉宗

教的勢力而實行侵畧之一例，當以法國爲最昭著，在法國勢力範圍之下的雲南一省中，天主教徒實有生殺予奪之權，使全省的苗族跪拜於膝下。教會實爲地方上之獨裁者，支配着中國政府的統治力所不能及的深小的巒巖。教會是經營着由小而大的學校，及醫院等，除却傳教以外，是藉這些機關以謀實力的擴大。

再從中國的教育設施上調查，更顯出中國成爲半殖民地的特性來。有力的大學校，其中多數大規模的圖書館，和研究所等，或間接上教會之手，或直接由外國的資本經營着。派往外國的留學生，除正式的官費生和自費生外，大多受着外國的文化團體的資助。這些助力，雖能提高中國文化的水準，却大阻碍中國教育之劃一化。並且留學生的數量之多，雖然對於本國的文化技術上貢獻不少，却令文化技術的建設過程上，附加特殊的條件和色彩。這一點，又因有下述的理由而更呈積極化。即是在中國也像在日本的情形一般，當其攝探外國的文化技術時，是不能在排外的政治，經濟勢力的過程中行之，反在外國之從屬化殖民地化的過程中行之。在排日

和抗日的思想裏，蘊釀着歐美的親善和聯俄等思想，其茁芽開葉的溫室，即是這種教育機構。

至於保健和衛生等設備，是在未發達的階段。霍亂實爲大衆每年流行的病症。鼠疫的發生地也是存在的。癩瘋、花柳、砂眼病、結核病等，蔓延也很廣。鴉片煙癮，對於促進上窒礙尤多。所有醫療和衛生的設施，仍屬極原始型的，醫生的數量不足，農村方面尤甚。醫療的方法，除一部分的大都市外，是極幼稚而且不完全。基督教的教會和外國的慈善團體，因此有特設的醫學校和醫院等。

和這種問題相聯關而不能忽視者，則爲母性及幼兒的保護問題，這方面可說是絕對還沒有特殊的組織。產母的發病率、和幼兒的死亡率，因爲生活條件之不真，保護組織之不周，及衛生設備的缺乏而愈高。

救濟這種狀態的文化設施，非出自中國政府及中國的文化團體之手，却由於外人之手。列強在華所設的文化事業，近年多由庚款維持。英、美、法、比、荷等國

，與中國政府共設庚款管理委員會，每年約有七百萬左右的投資。日本的對華文化事業，支出共有庚款的年利和膠濟鐵路國庫證券的年利合計四百萬日元，但其中是分作以下諸方面的投資：

(1) 教育上的投資——如東亞同文書院，及其他中學校，女子校等的補助經營。

(2) 學術研究上的投資——如東方化學業總委員會，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東方文化學院，日滿文化協會等經營或補助。

(3) 醫療設施——如財團法人的同仁會之在華的醫院經營是。

(4) 日本文化的普及——如北京、上海之近代科學圖書館是。

(5) 華北經濟開發助長——如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是。

日本的對華文化事業之投資，是比於列國既遲，且資額也較貧弱。中國的智識界之一代表者嘗言：「列國對華的文化事業，雖出於經濟侵略的假裝，而成爲一種欺騙政策，但在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改善上，却有不少的利用價值。我們認識文化事業的本質，且超越之利用以增進人民的福利。但日本對華文化事業上的投資，

豈不是找不出一竟的利用價值來嗎？」這可說是一個很尖銳的批評，表現出日本對華的文化事業之脆弱性。現值兩國的國交關係發生大轉變的當見，文化事業也成爲促進之一翼，應在使命上和內容上大有轉變。日本是應加以深刻的自己批判，努力克服這種弱點，爲新文化再建設的基礎。

三 對華文化事業再建設的基準和方向

再建設的基準是在於文化和經濟的提攜與共存共榮。文化的提攜究應從那方面進行呢？關於文化的發生是有種種說，文化實兼具民族的及世界的通性。在文化的形態中，民族的世界的通性是交流着，這是文化的原動力。日本的文化淵源是在儒佛兩教。當大化時代的華新期，前後遣隋使和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在於中國文化之直接輸入，於是儒佛兩教的思想先後輸入了。以後在日本的特殊性中成長的儒佛兩教，雖形成一起一伏地時盛時衰，但直至明治初年，實在文化界佔着主要的支配

方。明治時代雖因輸入西洋的唯物思想，致令古來的日本文化變形，但日本人的性格却一毫不變。反覺攝探西洋文化的精粹，從而同化之，以成新的日本文化。

中國的三民主義的政治指導原理，是由於機械的唯物思想氾濫於全民而採用的，破了東洋思想，日本的東洋精神的文化，與中國的西歐唯物的文化間之扞格，實為兩國的事變發生之思想的背景。

新文化的提攜之第一步，是在於三民主義及其理論體系之唯物主義的檢討和批判，及代之以全體的東洋的思想體系之研究和建設。華北實在有應設一個「綜合大學」的必要。兩國的提攜是不能不從經濟上實現。日本之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技術與組織，及中國富於未開墾的資源，這兩者實為經濟提攜的基礎，即日本以優越的技術努力開，墾資源，以圖中國人民的利益，日本的商品遂擴大銷場於中國。但中國同時要尊重日本的技術上之價值。又要設地質研究所，與綜合大學之理學部，工學部等之純粹自然科學的研究機關，及工業專門學校、工業學校、農業學校等技術機關

，以便於資源的開發。且中國雖屬農業國，而農民每人佔他甚少，採原始型的「分散的耕作」式，耕具全屬木製，即犁齒等也不用鐵。是特別具有使用技術之餘地。

日本現時足應參考英法兩國在華的政策。西康和四川的英國領事，實為技師，專對於中國人民施行技術的指導，及從事於資源的探究。僅用書記生管理外交上的事務。又北京近郊的周口店地質研究所之法國技師，原是牧師，但不傳教，却專研究地質。中國的保健和衛生上的設施，是專靠外國人管理的。檢疫所及預防的設施，除貿易港外是很少。文化上當設傳染病和風土等研究機關，及慈善醫院豫等。想戰事結束後，發疹室扶斯，回歸病將特別盛行，也應早行設定救急的方法。（本文作者，是上海近代日本科學圖書館的館長）

關於中日紛爭解決上的示唆

二見甚鄉著

日本在七十年前的開國時，已經發見世界上沒有餘剩的寸土，可以供牠發展的舞臺了。其後祇與諸外國協調，從和平中謀自己的伸展，甲午年的中日戰事發生，乃屬被動的。當時是壓制着領土的野心，和平地處理過剩的人口，為謀產業的進步起見而與諸國協調，欲得到移民的自由，經濟資源的公平分配，及商品市場的平等開放。但開國三十年之後，檀香山開始禁日本的移民，其後澳洲也實行「白種人的澳洲主義」，南美洲數年前也已經排斥日本的移民，即如秘魯，也祇能容納很少的移民了。

經濟資源之競爭和商品市場之競爭等，日本已遭各國的驅逐了。不得不向最鄰近的滿州蒙古和中國內地謀發展，中國實為日本民族之運命的，物理的進路。追溯

中日這一次事變的歷史，已非一朝了。甲午中日戰爭，起端是因事前中國對於日本不斷施以威脅和壓迫，開戰的近因，是由於中國不尊重朝鮮的獨立，而竟然派兵入朝鮮，北洋艦隊迴航於日本以示威嚇，當時袁世凱爲駐朝鮮公使，壓迫朝鮮的王室朝鮮既失却獨立，遂脅嚇日本的北境，至令日本的生存危險。經過中日戰爭後，日本雖然得着勝利，但下關條約訂結後數日，竟因俄、德、法三國的干涉，不得不把遼東半島交還中國。其後中國竟將包括旅順和大連在內的遼東半島永久租借與俄，其後俄人竟在旅順築要塞，設橫斷滿州連結西北利亞和海參威的中東鐵路，及以哈爾濱爲基點而至旅順之中東鐵路南部線，復得旅順煙臺之探煤權，與鴨綠江沿岸之森林採伐權，俄國軍隊遍駐南滿北滿，於是俄人又伸手於朝鮮而再脅嚇其獨立，同時也漸漸脅嚇日本的獨立，故日本又不能不再與俄國決戰，同時清廷的李鴻章和俄國使節羅巴諾夫間訂結一種密約，這一道密約是經蘇俄革命後，纔作秘密文件公佈出來。經過日俄戰爭後，日本犧牲十萬的兵士和二十億的戰費，纔把俄國在滿州的

勢力驅逐了去，繼承南滿一帶的俄國權益，這是經中日滿的善後協約所承認的。

其後中國發生國權恢復的運動，排日的空氣漸增，並敷設與南滿鐵路相對立的併行路線，又使日本在滿洲的土地商借權變為有名無實，經營成爲不可能。並且駐在奉天城內的日本人民很多，但在「九、一八」的事變以前，被華人驅逐，變爲無一人了。那時中國人還公言將收復大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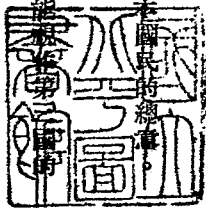
柳溝條的事件是出於一時的憤激而來的。……………

這一次華北和華中的事變之由來，決非偶然的。……………倘使中國政府承認滿蒙和華北的既成事實，與日本協力，這一次戰爭足可避免的。

現在把關於事變解決上的二三示峻，畧述如下：

(一) 今次日本對華戰爭，決不是少數軍閥之所爲，乃是出於日本國民的總意。這一點是中國及其他各國要明白認識。

(二) 日本在滿蒙與華北的立場，爲國防與國家的存在計，實不能不採取強硬之方針。



。這種政治關係，是不能拿歐戰前英帝國與比國獨立的關係來相比，中國若與蘇聯妥協，致令政治組織與社會機構與日本不同時，日本是不能坐視的。

(三)不深認識上述兩點，雖暫時講和，日後也必再戰。

(四)過去三十年中日的爭端，是由於中國否認日俄戰後日本在華所得到的權益，這一點不解決，恐怕戰爭到你死我活的。

(譯者按：本文的作者是最荒謬，無一語不是強調奪理，因其中許多處沒有翻譯的必要，祇得將其大旨畧述如上。又據本文著者所說，他曾住上海數月，竟敢把這種不值一文的翻譯譯成英文，送給英國人士觀看。我想英國人的眼睛是很光明的，像這樣喪盡良心，掩蓋事實的話，祇會被英人當做賣淫婦那樣斥退罷！)

以上六篇都自本年改造雜誌的二月號中選譯而來的。——譯者附註

戰第二期後抗
敵人的狂論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四月二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選擇者 章

弦

出版者 建國書店

發行人 賀復萌

總經售 教育書店

漢口交通路四十號
廣州教育路第八號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購

573

405010

封面：荻川谷作

BC

93.09

4/3